

← (上接9版)

“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无疑是两件工艺品画面聚焦的主题。唐代金榜题名,例以金花帖子通报及第进士家。宋代一般用于解试中举的场合,但民间仍应保留着金榜题名“修书报捷”的风俗,目的同样“一可以还前古之风流,二可以为乡党之美观,三可以杜捷子之纷扰”。“捷子”指私自报捷人,他们无非希图报捷讨赏。“凤楼人”指闺中人,邵武盍上与新建盘中都刻画她在楼头远眺,翘首待未婚夫或夫婿送来及第的捷报。仅凭词意与画面,很难断定这位“凤楼人”究竟是榜前择婿,还是榜前约婚,留下了让人想象的艺术空间。若是前者,南宋倒也有动人的故事。婺州举子刘鼎臣将赴行在临安省试,妻子执手送别时赠以自制彩花一枝,并附上自作词云:

金屋无人夜剪缁,宝钗翻过齿痕轻。临行执手殷勤送,衬与萧郎两鬓青。

听嘴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时情。明年宴罢琼林晚,酒面微红相映明。

这首《鹧鸪天》抓住少妇拿着彩花在夫君鬓边比试的分袂场面,千言万语说不尽离别之情,千叮万嘱这彩花是让你金榜及第后簪戴的,且待明年迎来宴罢琼林簪花归里的夫君,也不枉独守闺房的一片深情了。

然而,倘若细品《踏莎行》的两句词意,似乎后者可能性更大,喜剧感也更强。榜前约婚,经过望眼欲穿的煎熬等待,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妙就妙在用来刻画任何一方的心态都称得上贴切入微。可以是状元郎一方“修书速报”,无不自得地让报信者先去告知“凤楼人”,我这回可是货真价实的“风流婿”!也可以理解为“凤楼人”的“倚门之望”,企盼状元郎高中后,千万莫忘“修书速报”我这“凤楼人”,哎——这下你可真个成为我的“风流婿”啦!

笔者遍查中华书局版《全宋词》及其《补辑》有姓名与无名氏的作者名下,均未见收录这首《踏莎行》,复蒙《文汇学人》编辑搜“中华经典古籍库”告知,在《全宋词》附录《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里录有雷同之作。此词先后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与《古今小说·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分别托名主人公宇文绶与赵伯昇金榜题名后所作。唯“宴罢琼林”,两篇话本俱作“宴罢归来”;“醉游花市”,《简帖和尚》作“恣游花市”,而《赵伯昇》作“醉游街市”。据小说戏曲史家许政扬说,《简帖和尚》“文学史家公认为宋代话本”;而曲艺史家陈汝衡的

《宋代说书史》也将《赵伯昇》定为宋元话本。合理的解释是,这首所谓“元明小说话本”的假托之作,确是宋代众口流传的民间词佚作,所以才被书会才人趁手编入话本。这一推断,可以拉南宋宝祐元年(1253)榜状元姚勉出来作证。他的《雪坡集》收入及第后所作《贺新郎》,有小序说:

尝不喜旧词所谓“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男儿志”,以为男儿之志岂止在“醉游花市”而已哉!

所引旧词之句正与上引《踏莎行》吻合,有力印证了这首词风行一时,故而这位新状元也谨记在心。当然,他在词序里明确表示不全同意这首词的价值观:

此说殊未必然也,必志于致君泽民而后可。尝欲作数语易之而未暇,癸丑叨忝误恩,方圆前话,以为他日魁天下者之功,非敢自诤也。夫以天子之所亲擢,苍生之所属望,当如之何而后可以无负之哉。友人潘月崖首求某书之,是其志亦不在彼而在于此矣。故书不敢辞。

姚勉认为,金榜题名,释褐为官,应该有志于“致君泽民”,念念不忘“苍生之所属望,当如之何而后可以无负之”,不能一味在显摆与荣耀中自我陶醉。姚勉秉承了“为生民立命”的宋儒思想,出仕后也难能地维持了士大夫官僚的正面形象。姚勉的《贺新郎·及第作》也描写了殿试唱榜到前往状元局的全过程,故不妨也逐录如次,以与前引《踏莎行》对证比较:

月转官墙曲。六更残钥鱼声亮,纷纷袍鹁。翻座临轩清籁奏,天仗缀行森肃。望五色、云浮黄屋。三策忠嘉亲赐擢,动龙颜,人立班头玉。胪首唱,众心服。

殿头赐宴官花簇,写新诗、金笺竞进,绣床争蹙。御馐新沾催进谢,一点恩袍先绿。归袖惹,天香芬馥。玉勒金鞵迎夹路,九街人,尽道苍生福。争拥入,状元局。

如果说,姚勉状元词里“九街人,尽道苍生福”慨然自许地揭明了士大夫精英的价值观念,那么邵武盍与新建盘上状元词里“这回好个风流婿”则形象直白地投射出普通民众的思想心态。金克木认为,思想史有两套,“一套是书本里的名家著作”,“另一套是书本里没有专著的普通人的思想”,他呼吁在关注著作家的思想史同时,尤应发掘普通人的思想史,然后“希望有人能把两套合一起来研究并写作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两件工艺品上篆刻的状元及第报信归里的画面与那首广为流播的民间词,正是南宋普通人在科举及第上思想心态的真实折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追忆荒木见悟先生

彭国翔

今日(2017年3月23日)忽闻荒木见悟先生昨日辞世,不禁让我回忆起昔年的往事。荒木先生的学术贡献,至少在专业的学者圈中已是众所周知,无需我这里赘语。而其生平事迹,相信也自有其门人弟子介绍。我与荒木先生的交往,之前似乎从未向人提起。如今他驾鹤西归,就让我记下与他交往的雪泥鸿爪,作为我个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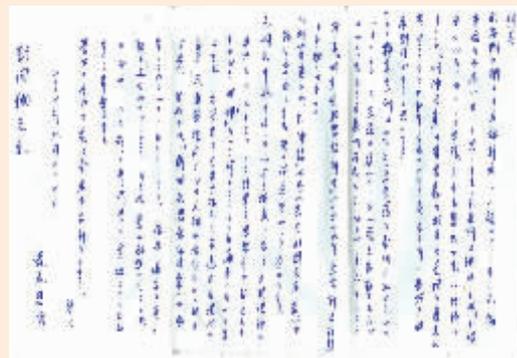
我最早知道荒木先生的名字,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泛观博览海内外的各种著作,当读到狄培理(W. T. de Bary)先生主编的《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一书时,我对其中 Araki Kengo 撰写的一篇“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Ming”印象极为深刻。后来才知道,这位 Araki Kengo,就是荒木先生姓名的英文拼写。

由于我的硕士、博士论文以中晚明的阳明学为题,而荒木先生是研究晚明思想尤其阳明学与佛教关系的大家,我在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期间,自然就进一步阅读了荒木先生的著作。荒木先生和另一位日本学界阳明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号称“九州二老”。由于冈田先生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较早地被译为中文,中文世界似乎对冈田先生知道得更多些。尤其近些年他的《王阳明大传》也有了中译本,在阳明学热的社会潮流之下,很多学界以外的社会人士也都知道了冈田先生的大名。相较之下,荒木先生的名字,恐怕在中国仍然限于学界中人所知。不过,自我大学时接触冈田和荒木两位先生的著作之初,我就认为荒木先生的研究更为精深。后来随着我对明代思想尤其相关古籍了解和阅读的天日深广,我益发加强了这一判断。

2001年之前,荒木先生对我来说一直都是纸上的人物。我对他的关注,也仅限于其论著。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和荒木先生这个“人”直接发生了联系。

1996年我在阅读周海门的《东越证学录》时,已经对于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产生了疑虑。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将周海门划归“泰州学案五”。但是,我阅读《东越证学录》得出的印象,却是无论从自我认同、思想倾向还是地域划分来说,周海门都属于浙中王龙溪一派。除了周海门自己的《东越证学录》之外,其他晚明文献的相关史料,也都不断印证了我的观察。而在我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一边随时搜集史料,思考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以及泰州学派的构成问题时,我读到了荒木先生收入其《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一书中的“周海门の思想”这篇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我看到荒木先生对周海门在《明儒学案》中的学派归属表示了疑问。不过,荒木先生虽然提出了疑问,却尚未对黄宗羲的划分做出否定。由于我自己已经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以及泰州学派的构成产生初步想法,荒木先生未尝深究的点到即止,就进一步激发了我彻底追查和澄清学术思想真相的念头。终于在2000年访问台湾期间,我自信已经掌握了充足的史料以及厘清了论证的线索和理路,于是写出“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这篇专论。当时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只有荒木见悟先生对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有过质疑。因此,我那篇专论完成之后,除了一两位前辈学者之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寄给荒木先生,看看我从“史料”与“论证”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否足够令人信服。

2001年8月,我收到了荒木先生的回信,不仅对我的论文予以充分的肯定,更是指出了明代思想世界甚至《明儒学案》中一些人非“儒”之一字所可范围。这的确是一个慧见。他甚至勉励我编一部“新明代思想家学案”。正是在得到荒木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之后,我才将论文投给台湾《清华学报》,于2012年9月正式发表的。距离我在2000年夏天完成此文,已经是两



2001年8月荒木见悟先生致作者信

年之后了。

2003年,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在台湾初版。当时身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我拜托学生书局给荒木先生寄了一本请正。2004年5月,我收到荒木先生的来信。记得那是一张很雅致的明信片,上面除了荒木先生中文的字迹之外,因为需要有我的在美地址这一缘故,还有他的英文手迹。这是荒木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信函。

收到信时,我以为这就是一封答谢函,因为信末有“不知自己的学力和体力能够了解多少”这样的话。荒木先生是1917年生人,到2004年时,他已经是87岁高龄了。所以,“体力云云”,我当时是当真的。而“学力”之说,显然是老先生的谦辞。不过,正是由于我并未细究,结果竟然忽略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部分。原来,不知何故,老先生并未收到我的《良知学的展开》而希望我再寄一次给他。这一点,我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直到如今获悉荒木先生过世,唏嘘之际找到遗墨,并请精通日文的友人陈玮芬女士辨认,才发现了这一阴差阳错。此时此刻,“遗憾”二字于我就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实在是一种真切而强烈的心情了!早知如此,我当然会再寄一本给他。以老先生一贯的认真与深厚的学养,一定会像当初看过我检讨周海门学派归属与泰州学案构成的那篇文章一样,再次惠我以极具卓识与前瞻性的指教。

在那之后,因我的研究兴趣和领域日益广泛,不再限于中晚明的阳明学,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未与荒木先生联系,尽管我但凡涉及明代思想的各种议题时,一定会想到荒木先生。我曾与荒木先生著作忠实的中文译者廖肇亨先生多次提起我对荒木先生学问的敬佩;在指导我的博士生撰写关于管东溟思想的博士论文时,我也首举荒木先生开创性的大著《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指定作为需要深究细参的必读参考书。

2004年以后虽然联系不多,但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了荒木先生寄来的关于陶望龄思想研究的抽印本论文。扉页有他工整的题字。我想,这是因为在之前的信中,我曾提及对于“二陶”的兴趣,表示要进一步追究浙东王龙溪以降包括周海门、陶望龄和陶爽龄兄弟的思想谱系与脉络这一缘故。如今,我指导的一位学生已经完成了有关管志道思想的博士论文并顺利毕业,另一位正在撰写关于“二陶”思想的博士论文,而我自己追究龙溪以降浙东儒学演进的计划,虽然因其他研究之故而进展迟缓,却并未终止。能够于明代广袤思想世界真正深入其中的前辈知音原本无多,如今,荒木见悟先生这位当之无愧的前辈大家又遽归道山,思之如何能够让我这位后学小子不倍觉伤感呢?

因此,尽管我和荒木先生从未谋面,我们有限的几次通信也远远算不上联系密切,但我仍不禁有感而发,写下这篇小小的文字,追忆往事,作为我个人对于荒木先生的怀念与纪念。老先生恰好以百岁高龄而辞世,固然令亲朋好友以及像我这样的后学小子难免伤怀,但对于如今这个“多故”的世界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吧。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